

中古文學史論文集續編

◆ 曹道衡◎著

文史哲大系〇七八

文津出版社印行



中 古 文學史論文續集

文史哲大系 ⑦⑧ 曹道衡著

文 津 出 版 社 印 行

中古文學史論文集續編 / 曹道衡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津, 民83
面 ; 公分. -- (文史哲大系 ; 78)
ISBN 957-668-222-3(平裝)

1. 中國文學 - 歷史 - 論文, 講詞等

820.903

83005929

⑦⑧ 系 大 哲 史 文

中古文學史論文集續編

著 者 : 曹 道 衡

發 行 者 : 邱 家 敬

出 版 者 : 文 津 出 版 社

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二九四巷一號

郵政劃撥 : 〇〇一六〇八四一〇號

電話 : 三六三五〇〇八・三六三六四六四

登記證 : 局版臺業字第五八二〇號

定價 : 新台幣三九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七月初版

ISBN 957-668-222-3

序

傅璇琮

道衡先生於一九八五年在中華書局出版他的《中古文學史論文集》時，我正任中華書局副總編，分管文學編輯室的業務。在此之前，中華書局也出版過一些學術論文集，但著者都是七八十歲或已去世的老學者，如游國恩、余冠英、王季思，以及孫楷第等久負盛名的前輩耆宿。那時道衡先生只不過五十開外，按照中華書局的慣例，似還輪不到編印個人學術論文集。文學編輯室諸同仁遂為此事與我商量，我們一致認為此例當破，遂毅然付印，結果反應極佳，讚譽中華書局不但為中古文學研究作了一件好事，也為像道衡先生那樣潛心於書齋、超然於競途的學者稍給予精神上的慰藉。

現在，我忝為中華書局總編，却接到道衡先生告知，說他應臺灣文津出版社之請，擬將近年所作之文續編成集，並囑我為文集作序。我很慚愧在我主筆政之際未能將道衡先生有關中古文學研究論文編成續集在中華出版，但也欣喜臺灣的出版界同仁有學術眼光，能將大陸的高水平著作及時介紹給臺灣學界，也預祝道衡先生的新著能為海峽兩岸的文化學術交流作出新的貢獻。

我於中古文學，雖有愛好，却無研究。五十年代時曾在北京大學隨先師浦江清先生治兩宋文學，後又在中華書局於編務之暇輯成《黃庭堅和江西詩派》、《楊萬里與范成大》兩部研究資料彙編。因探索唐宋詩之異同乃對唐代文學發生興趣，這是六七十年代之際事。又受到陳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通貫幾代史事的治史方法的啟發，乃又從唐代上溯魏晉，寫了幾篇考證文章，不久却又因種種原因，重理唐宋文史。可

以說我對魏晉南北朝文學是淺嘗輒止的，但也因職業和興趣的原因，對這一段的文學研究，一直頗為關注，也還因此，道衡先生的文章，在其發表之初，我即大多拜讀，現在結集成書，又使我能有機會來思考這一時期文學研究的歷史和現狀。

中古文學的研究，在整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確是較為冷寂的。過去也有些文章探究其原因，往往歸結為這一階段的文學自身比之唐宋明清來，無論內容與形式，有種種不足。這種說法可能有一定道理，但我覺得與實際總還隔了一層。我想研究人數的多少與研究成果的豐歉不一定成正比，而一個時期文學成就的高低也不一定即決定研究水平的高低。我有一個想法，魏晉南北朝文學，或通常所說的中古文學，較之唐詩宋詞，明清小說，其研究難度相對來說似乎較大，因而出成果也較不易。一個人研究某一唐代詩人、宋代詞家，或者元明清的某一部戲曲、小說，可能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即能有所成，但在相同時間內來研究中古時期的某一作家作品而要有所得，却難得多。人往往有避難就易的習性，如果能俯拾即得，為什麼還要去跋涉長途呢？這樣，中古文學就自然難以形成熱門或熱點，正像自然科學中有些領域和課題，雖然本身或許蘊含較大的價值，但由於研究難度高，不能短期見效，它就始終只能為少數人在實驗室、在野外默默地進行着。

那麼中古文學研究之難又在何處呢？這當然也不是短短幾句話就能夠說全的，而且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有所見，難以一概。我覺得中古文學研究之難，主要不在於如後代那樣需用全力搜尋大量的不經見的材料，而是要在較高的學識素養上來細心研索材料，又要兼具文學、史學、經學的根柢，把研究對象放在社會文化的整體歷史背景下加以觀照。本

世紀以來凡在這一領域作出較大成就者，如劉師培、魯迅、陳寅恪、唐長孺等，都莫不如此。在當今，我認為曹道衡先生即是繼這些前輩學者，在中古文學研究中創獲最多、最有代表性的一位。

我想我的學力實還不足以來概括道衡先生的治學業績，這裏只就我所見及的談幾點他在中古文學研究中的創新之功。一是他對整個北朝（包括十六國）文學的研究，從搜集零散的材料到董理成系統的脈絡，使我們對北朝的辭賦、詩歌，以及整個學術文化，有一個清晰的、合乎歷史發展實際的認識。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而只有做到這一點，才能對當時整個南北朝文學有整體的把握。二是他對不少作家作品以及某些文學事件的考證，可以作為科學的結論而為人們所引用。時代較早的，如關於《兩都賦》、《二京賦》的寫作年代和主旨，然後，從東漢末及建安，依次而下，如桓譚、曹丕曹植、陸機陸雲、干寶、郭璞、鮑照、江淹、裴子野、王琰、何遜、王褒、邢劭、任昉等等，有關他們的生平、行迹、交游、著作，都有精細的考證。應該說，有關這一時期作家作品的考證文章，這些年來確也不少，但有些文章每使我想起王國維的兩段話，一是《毛公鼎考釋·序》：“自來釋古器者，欲就無一字之不識，無一義之不能，而穿鑿附會之說以生。”又一是他為容庚《金文編》所作序中云：

孔子曰“多聞闕義，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許叔重撰《說文解字》，竊取此義，於文字之形聲義有所不知者皆注云闕。至晉荀勗尋寫定《穆天子傳》，於古文之不可識者，但如其字，以形寫之，猶此志也。宋劉原父、楊南仲輩釋古彝器，亦用此法。自王楚、王俅、薛尚功之書出，每器必有釋文，雖字之不可識者，亦必附會穿鑿以釋之，甚失古人闕義之旨。

以我所見，一些考證這一時期作家作品的文章，所持證據尚不足，即強為立說，並自詡為創見。我想，我們搞考證的，其弊有時倒不在下不了結論，而是為王國維所說，雖“絕不可識者”，也“必附會穿鑿以釋之”。對比之下，道衡先生的考證，既精細，又通達。他們有些推論，應當說是有充分根據的，如本書《論王琰和他的〈冥祥記〉》，援引《隋書·經籍志》等書，推論王曼穎為王琰之子，又從證實王琰生活的年代，甚富新見，且極有論據，但他還是作為推論看待，仍不作為結論。

我感到，我們的古典文學研究進展到現在，各種論點、說法已有不少，需要有人作一種科學歸納的工作，把能够成立的，符合於文學史實際的，就作為定論肯定下來。這是我們古典文學研究所必需做的學術積累的工作。這也像自然科學那樣，應當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往前開拓，能作為定論的點越多，就標志這一學術發展水平越高。我相信，如果有人對中古文學研究來做這方面的工作，則道衡先生論著中可以作為科學結論而列入學術成果積累的，當居首列。

其三，道衡先生治中古文學，還不限於具體問題的考證，而還在於達識。他往往把某一作家或作品與社會歷史、學術文化貫通聯繫，從而使人們對此問題的認識進入一個新的境界。如本書論陶淵明，從其文風與為人考察晉宋之際有一江州文人集團的存在，他們與長江下游及浙江地區的高門大族文人有明顯的不同，又如論《雪賦》與《月賦》，能與作者身世遭遇及政治變故聯繫起來，分析二者風格的差異。著者對經學素有根柢，正因為此，書中對《大狗賦》作者賈岱宗的時代，才能糾前代典籍之失，並進一步討論偽《古文尚書》流行北朝的時間，由此還解決了南北學術交流的一個大問題。我由此想到，中古文

學研究之相對冷寂，未始不是好事。因為這段文學研究所要求的知識水準高，這才不至於濫。我們可以在報刊上看到唐宋詩詞、明清小說的不少陳詞濫調，因為這類文章容易做，而相比之下，這樣的文章在中古文學研究中就少得多。中古文學研究能保持學術領域中的嚴肅性，是很不容易的。我想，這是與在這一領域中有像道衡先生那樣具有高標格的研究者，有很大的關係。

當今在大陸治魏晉南北朝文學，學識、人品為我欽仰者，有道衡先生和天津南開大學中文系主任羅宗強教授。他們治學的側重各有所不同，但兼具專精與宏通，則為學界所認同。我的慶幸的，是我於數年前曾為羅先生的《玄學與魏晉文人心態》一書作過序，今又能為道衡先生的第二本論文專集寫序。兩位先生的學術成就都迥然出於我之上，我謹當追隨他們之後，繼續就力之所能，為學術界盡一點微力。這也就是我之所以不避僭越而敢於寫這篇序文的私意所在。

一九九三年五月，北京

序

鄧紹基

我國素稱禮儀之邦，人與人間的稱謂豐富繁多，同一種稱謂的內涵和表現形式又有很大彈性，比如“學長兄”的稱呼，即尊敬又親切，但有時也會成為客套，其間區別大抵都視具體情況而定。我總是習慣以“學長兄”來稱呼與我長期共事的曹道衡教授，在年齡和學歷他是我的學長兄，在我們近四十年的同事過程中，他對我幫助很多，我也經常向他求教，從這個意義上說，他也正是我的學長兄。

今年喜逢文學研究所建所四十周年，道衡學長兄是在建所那年即一九五三年到所工作的，我晚於他兩年到所，那時所址在北京大學內，我們在未名湖畔相逢相識，我們不僅同屬一個研究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組，而且又同在一個課題組——何其芳副所長領導的《紅樓夢》研究小組。按照課題組內的分工，他研究清初的幾位思想家，我則研究明末的短篇白話小說。課題組內經常舉行討論會，於市民文學的概念問題就討論過不止一次，道衡兄的發言總是準備充分，列有提綱，博聞強記，中西兼備，使我十分欽佩。後來我逐漸知道他不僅熟習中國傳統文學，對史學和經學也有豐瞻的學識，對經典理論著作也讀得很多。同他相比，我自覺小生譾陋。承他不棄，我經常向他請教。七十年代初，我在呈念貽兄的一首詩中有“挑燈紀事君才富，覓句尋詩我藝窮”之言，用這兩句來說明道衡兄和我之間的“富”和“窮”，也很切合。這不是客套，乃屬真情。

在道衡兄面前，我的請益又是無拘無束的。五十年代中期，我們天天同在一間工作室——北大哲學樓二〇五室，他的散放着縹帙和卡片的書桌左邊有一根水管，右邊是一排水汀，

他戲稱為“左管右汀齋”。就在他的“齋”前，我不時以爭論乃至“抬槓”的方式向他求教，我記得我曾就《左傳》和《公羊》、《穀梁》的“優劣”問題《新學偽經考》的評估問題，再連類到經今古文學問題，不止一次和他“糾纏”，目的是引發他的高論。他總是大聲笑着和我辯論，對我的“無理攪三分”態度也並不介意。當時同在哲學樓二〇五室內讀書、寫作的還有王佩璋和劉世德幾位同人，有時我們之間也會發生“雅文學”和“俗文學”之爭，此時此際的道衡兄就成為少數派，成了孤家寡人，但他堅持孟夫子“余豈好辯哉”的傳統，總是不甘處於下風。有一次我故意提出一個老掉牙的問題：“春王正月”有何好處？他不假思索地反詰：《西山一窟鬼》是否胡鬧？於是笑聲大作，還驚動了旁室同人。書生少壯，歡樂如斯，今日回首，感慨良多。

上述“挑燈紀事”云云，確也具體有所指，那是說的六十年代初期編寫三卷本《中國文學史》事，這部文學史一九六〇年開端，一九六二年告竣。道衡兄這時集中力量專攻中古文學，三卷本文學史中的中古部分的章節，大抵都由他執筆。文學史出版後一年，由於衆所周知的社會原因，我們都中斷了研究工作。歲月不居，時節若流，道衡兄與我幾乎都是在人生的黃金時代喪失了不少做學問的時間。如同他在《中古文學史論文集》的《後記》中所說，我們無須過於強調客觀的困擾，更不必怨天尤人。在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後，道衡兄正是仗着他淵深的學識根柢，加上他勤奮、謹嚴的治學態度，終於在學術研究上有了更多更大的收穫。他的關於中古文學史的研究成果，被學人允推為學力堅實、創獲豐碩，在當今這一研究領域內處於領先地位。在出版《中古文學史論文集》之後，他又將近年來的有關論文結集，謂之續編，付印以前，囑我寫序。我雖²⁴自忖不是

為這本著作寫序的合適人選，但我們之間長達四十年的交情使我不敢推辭。受命之後，我拜讀了集中若干篇先前未及目見的論文，我再次感受到道衡兄學力的深湛，更加欽佩他鍥而不捨的鑽研精神。

大凡研究中古文學史的學人都知道，這一領域已難有孤本秘笈的發現，材料大致現成，前人也有種種既成說法，重要的是要深入鑽研，從頭開掘，才會有所發明，有所創獲。比如把江淹、鮑照並稱，隋唐時代已出現，杜甫秦州詩《贈畢四曜》中就有“流傳江鮑體”之言。文學史上出現的並稱、合稱現象是十分複雜的。後人作解，難免仁智各見，杜詩注家對“江鮑體”的解釋就頗見紛紜，還出現過那種注猶未注的贅文廢話乃至是猜度臆說。作為文學史研究家，就必須找到一種符合實際的解釋。道衡兄在《鮑照和江淹》一文中對這個問題作了細致的考察、研究並論說，在對江、鮑兩人詩風有同有異的比較中展開了論說。無論從理論上說，還是從作家的創作實踐上說，作家之間的類同不是絕對的，這裏同的表現形式恰恰是同中有異，有同有異。作為文學史現象的探討，研究江、鮑合稱，又不是局限於合稱本身，而是為了說明當時詩風的一種繼承和轉變關係。實際上，我想道衡兄撰寫《鮑照和江淹》一文時正是從較宏觀的視野出發的，這篇論文與《江淹、沈約和南齊詩風》是相互聯繫和呼應的姐妹篇。在後一篇中，乍看似乎只是提出了一個從時代考訂就可發現的問題即江淹才盡之際，沈約成名之時。但實又不是時間上的偶然現象，而是有着詩壇風氣變化的原因。這樣也就更加深入地揭示出江淹詩風正好標誌着從鮑照到謝朓、沈約的轉變階段，也就是從“元嘉體”到“永明體”的轉變階段。如果籠統地說，鮑照和江淹都代表了從“元嘉體”向

“永明體”過渡時代的詩風；如果細致地說，江淹詩實又較鮑照詩更靠近謝朓和沈約的筆調。即使有了這種更靠近的直感，要具體地論說清楚，還須要學力和識力，而一旦被梳理清楚並加以照曉揭示後，反過來又有助於關於從“元嘉體”到“永明體”的發展過程的論述，對這一過程的闡述顯得更加清晰、更為豐滿。前幾年，學界有股空疏之風，有些人動輒指責“繁瑣考據”，乃至把繁瑣變成細致的同義語。文學史上的大大小小文學現象的發展軌迹，正是依靠着細致的梳理才能有昭明的論述，即使前人已大體說明白了的文學現象，也還須後人去豐富、補充。這樣，更有利於被美學家、文藝理論家吸收和採用，從而有助於他們作出同層次的理論性概括。文學史家未必就是文學史學家，文學史學則歸屬文藝範疇。世上儘管存在碩學鴻儒，但在一般情況下，學問總是有分工、有配合。

我對中古文學史雖無研究，但我也發現，在道衡兄的這本中古文學史論文續編中，新見迭出，創獲很多，如論應劭《風俗通義》與魏晉六朝小說的關係，如探討江州文人集團的存在及其特點，如考定偽《古文尚書》在北魏時已傳入北方，等等。這些新見，分別涉及古小說的發展、晉宋之際南方文人集團之間的異同和南北學術文化交流諸問題。類似這樣的新見，與目今熱門顯學中不時發生的甚至是着意製造的“轟動效應”是無緣的，但它們必定會引起研究中古文學的學人的注意和重視，而且也會成為這個研究領域中的可貴積累。

道衡學長兄堅持實事求是的學風，他推崇清代樸學家的言必有據的治學精神，他鄙視種種飛揚浮華，不重名實，譁眾取寵，旨在驚聽的不良習氣。他踏踏實實、勤勤懇懇、探賾洞微，鉤深致遠。他的研究成果，如果單獨地看、是在論述各類具

體問題，匯總起來，却又給人以開闊拓展領域的感覺我想我的這種感覺非屬一人之阿好，我相信我的感覺會從文學史研究界的公言中得到驗證。

以上云云，權當作序。

一九九三年五月

目 錄

序一	傅璇琮 1
序二	劉紹基 6
一、略論《兩都賦》和《二京賦》	13
二、桓譚生卒年問題志疑	28
三、《風俗通義》和魏晉六朝小說	35
四、從魏國政權看曹丕曹植之爭	49
五、試論陸機陸雲的《為顧彥先贈婦》	65
六、山林隱逸與山水詩的興起	77
七、論袁宏的創作及其《後漢紀》	99
八、東晉南北朝時代的涼州文化	108
九、略論晉宋之際的江州文人集團	121
十、論顏延之的思想和創作	137
十一、從《雪賦》、《月賦》看南朝文風之流變	156
十二、鮑照和江淹	170
十三、江淹沈約和南齊詩風	181
十四、江淹作品寫作年代考	207
十五、論任昉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244
十六、論王琰和他的《冥祥記》	261
十七、論江總及其作品	281
十八、談南朝樂府民歌	293
十九、再論北朝詩賦	301
二十、論北魏詩歌的發展	316
二十一、略論北朝辭賦與南朝辭賦的異同	325
二十二、讀賈岱宗《大狗賦》兼論偽《古文尚書》流行北朝時間	340

二十三、論北齊詩歌的歷史地位	347
二十四、關於《劉子》的作者問題	360
二十五、從《切韻序》推論隋代文人的幾個問題	368
二十六、讀書札記	379
釋“三五”	379
陸機的籍貫問題	380
“赤岸”地點考補	381
《秦王飲酒》的“秦王”	382
“道士”與“道人”	383
二十七、孔門弟子(一)	386
二十八、孔門弟子(二)	394
二十九、孔門弟子(三)	401
三十、孔門弟子(四)	407
三十一、孔門弟子(五)	413
三十二、文學研究與經學	419
三十三、漢代的“經今古文學”	426
三十四、《淮南子》和“五經”	435
三十五、論崔浩的歷史地位及其死因	448
後記	463

略論《兩都賦》和《二京賦》

班固的《兩都賦》和張衡的《二京賦》同是東漢人的創作，又同見於《文選》；它們的內容都是把西漢的都城長安和東漢的都城洛陽作比較，而且結論都是盛誇東漢制度的合於儉德，以譏西漢的奢侈，從這些主要的論點來說，兩者都是類同的。造成這些類同的原因，據《後漢書·張衡傳》說：“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可見《二京賦》之作，本是以《兩都賦》為藍本。但也有一說認為張衡是不滿意《兩都賦》而作《二京賦》，如《藝文類聚》卷六十一云：“後漢張衡《西京賦》曰：‘昔班固睹世祖遷都於洛邑，懼將必逾溢制度，不能遵先聖之正法也，故假西都賓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而為東都主人折禮衷以答之。張平子薄而陋之，故更造焉’。”這段話不見今存《西京賦》，不知是否為後人給《二京賦》加的序，正如現存的司馬相如《長門賦序》，顯然為後人所加，而《西京賦》這段文字在收入《文選》時被蕭統所刪去。可是庾信《哀江南賦序》已有“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語，足見此說在南北朝時已流行。張衡對《兩都賦》究竟怎樣評價，已難確知。但關於《兩都賦》和《二京賦》有一點却是明確的，即《二京賦》之作，雖有模仿《兩都賦》的地方，而二者的寫作時間不同，社會和學術背景各異，因此細讀起來，其立論和出發點也很不一樣。

《兩都賦》和《二京賦》的寫作年代，至少相差有二十年之久，按歷史上一般情況而論，二十年並不是一個很長的時間，但在這二十年中，東漢一代的政治狀況和學術界的情形，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班固的《兩都賦》，歷來多數研究者均以為作於漢明帝永平（58—75）期間。例如：陸侃如先生《中古文學系年》認為《兩都賦》完成於永平九年（第89頁）。朱冠華先生《兩都賦李善注正補》則認為“本賦當作於永平十二年後，十八年前”（香港《中華國學》第二期）。筆者在《漢魏六朝辭賦》中，也認為此賦作於漢明帝時代。這是因為《後漢書·班固傳》說：

自為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宮室，浚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

根據《後漢書·班固傳》的上文：“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等語看來，班固“遷為郎”時間，當為明帝時。所以鄭大鶴先生推測《兩都賦》作於永平七年（64）；陸侃如先生以為九年（66），大抵即由此立論。但除此以外，還有一種看法即根據今本《文選》李善注在“《兩都賦》二首”一語下有：“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等語，因此認為《兩都賦》應作於和帝時。龔克昌先生在《漢賦研究》中採用此說，認為：“按《漢書》成於章帝建初年間，那麼《兩都賦》的寫作當在此之後。”（第222頁）不過，那條注文的真偽是存在問題的。因為從清初何焯起，就對它提出疑問。後來胡克家《文選考異》云：“今按，此一節非善注也。善下引《後漢書》，‘顯宗時